

J292.11
7

J292.1
110

694614

中国书法名家

董其昌

书法精品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董其昌 / (明) 董其昌书; 刘建龙著.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12
(中国书法名家)

ISBN 7 -5434 -4593 -X

I.董… II.①董… ②刘… .III.汉字—书法—作品集—中国—明代 IV.J29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6297 号

顾问	王朝闻	徐邦达	黄苗子		
	沈鹏	欧阳中石			
编委会主任	王亚民				
编委	薛永年	刘正成	王镛	朱关田	
	李一	刘守安	王亚民	倪文东	
	张振国	张子康	刘 峥		

中国书法名家 董其昌
刘建龙 著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制版	北京图文天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30	1 / 32	8 印张
出版日期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 -5434 -4593 -X / J · 283		
定价	39.00 元		

前言

从汉字诞生起,便有了中国书法。人类一开始即按照美的法则创造世界,古老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以其特殊的物质条件与笔法结构,留下了后世不可企及的美。后来者对书法美的追求有了“自觉”的性质,在书法中注入了前人没有的艺术因素,但并不总是如通常所说的那种“不断超越”,更不是也不可能是全面的超越。

每个时代的书法,相对于前代与后代都各有特色,有其不可替代的特点,汇成历史发展的长河。研究书法的历史不能不研究书法本体的历史,书法是一种独特的艺术语言,文字及其演变对书法是第一推动力。中国书法以线条构成方块形,结构大体上从繁到简,笔法从相对单一到多变,章法从相对静止增加了运动繁富。无论真书、行草,开初都以实用为目的,然而也无不伴随着艺术,尽管追求的程度和意向有很大区别。书法本体受约于书法的创造者与接受者共同形成的一股合力,受约于书法发展的大环境——特别是文化环境给予的影响力。书法本体是书法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最为本质的力量。

书法家顺应书法本体的力量,是书法历史发展中最具能动力量的,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那些被尊为划时代大师的人物,他们的意义在于开创新的风气,新的流派,给人以不同寻常的审美观念。他们的杰出成就不仅在于承续了传统的精粹,更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涵盖时代,启示后人的理念。一部书法史,如果没有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苏轼、黄庭坚等杰出人物,必定黯然失色,无从写起。书法史在相当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书法家的历史。而在秦汉以前的篆隶时代,书法从总体而言还没有成为文人的专业,还有大量的民间书法,也没有留下作者名姓,他们是书法史上的无名英雄,对推动书法发展起着深层的铺垫作用。忽视书法史上“无名英雄”的作用,也就是没有充分理解书法本体力量,没有充分认识书法的广泛的群众性。

但是留下姓名的杰出人物毕竟伟大。杰出人物顺应历史又开拓历史。

艺术失去个性,即无所谓共性。没有杰出人物的创造,便谈不上时代风格的高扬。任何时候不存在抽象的、不可触摸的‘中法’,‘书法’通过书法家获得定在。而书法家的定在,又贴附着作品。杰出书法家的众多作品是无不具有个性的。王羲之的《兰亭序》与《丧乱帖》、《姨母帖》,颜真卿的《多宝塔》、《家庙碑》与《祭侄稿》,各因其个性而汇合成书法家不平凡的特殊性。对大书法家的研究要深入到书家多样的风格及其演变的历史,从客观到微观,从纵剖面到横断面。

每件有代表性的杰出作品,都是艺术家全部文化素养与人格的一种折射。扩而言之,必定是时代性格的某种折射,综观杰出艺术家的一生,这种折射就更显示多棱角、多色调。所以研究一个书法大家、一件杰作,就要置于特定的时代环境中,寻找轨迹,确定坐标;看比前代与当代人增加了一些什么,也要看比前人、当代人甚至他本人减少了一些什么,以及对后世产生何种影响力,包括积极的与消极的两个方面。书法家的形象塑造,是全部社会与历史在发展中形成的,并且还在继续。

由于书法艺术自身的特点,历来评价书法,时常使用过分抽象的、不确定的词语。这一点,甚至可以说同中国语言习惯中的模糊性有着关连,但是也同中国书法的抽象性分不开。再是历来的书法史在谈到某家某派时,偏重师承关系;谈师承是必要的,但有时失于简单化,陷入线性思维的模式。就其现实意义来说,不免束缚创造意识。如何多角度、多方位地研究艺术家及其作品,我们应当做得比古人更好些。我们要把特定书法家的全部活动看做是社会本质与书法本体的一个显现。

当代书法进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一方面是物质条件改变了书法赖以存在的书写条件,另一方面,书法在有限范围内呈现繁荣,倔强地生存。我们的立场无疑要做书法繁荣的促进派。当代书法在面向时代与开拓未来的困境中从理论与历史研究寻求启发。这就必然赋予书法史以当代的性质。它不是任意改造历史,而是由既往的历史总结规律,探求新的生命,新的活力。

基于以上所述,我们要感谢《中国书法家全集》的策划者、编著者和出版者,是他们顺应时代要求,启动着一项大有裨益的工程。

沈鹏

目 录

第一章

生平概述

- 1 -

时代背景 / 1

其 人 / 4

交 游 / 7

作为鉴赏家 / 26

客观总体评价 / 41

第二章

艺术历程

- 53 -

书法艺术 / 53

绘画艺术 / 109

艺术思想感情 / 136

第三章 论艺摘录

- 179 -

书 法 / 179

书 道 / 186

自 评 / 188

附 录

- 190 -

常用印章 / 190

年 表 / 193

主要传世作品目录 / 201

主要参考书目 / 216

释 文 / 220

第一章 生平概述

时代背景

明代嘉靖至万历期间（1522～1620），江南的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国内海外贸易发达，以商品流通为重点的市镇大量出现，经济状况的变化带动了整个社会的转变。明王朝固有的依靠思想控制、只略微依靠专门技能的官僚政治的程式化管理，已被倾覆。随着1582年首辅张居正的谢世，人亡政息，以个人管理来代替彻底的制度变革的改革宣告失败，帝国统治问题没有解决，中央王朝施政彻底失落了，这反而刺激了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自由发展。

货物和白银流通的激增，商人阶层和集团成为社会重要角色，社会风气由此发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变化。崇尚金权，生活方式转趋消费与物质享受成了时尚，文化艺术要求创新与多样，这些均属当时的客观历史现象。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当权者的物欲，也带动了社会风气更趋浮华。社会的转型似乎不可避免要带来一些乱源，而转型所产生的物质生活提升的诱惑使大多数人难以抗拒，在旧有的思想观念下，人们透露出无所适从的心态。

“自世宗御宇（1522年）以迄于今（1579年）科第日增，人文益盛。里巷诗书，户不绝声。惜文胜实衰，士风民俗，去成化（1465～1487）弘治（1481～1505）似稍不及耳。”

“五十年前，杭人有积货钜万，而矮屋数椽、终身布素者。今服舍僭侈，拟于王公；妇人妖艳，得为后饰。甚至贱金银而争侈珠玉。每吉凶会聚，盈头缟素，有识者知非吉祥。”

“嘉靖初年，市井委巷有草深尺余者，城东西僻（地），有狐兔为群

者。今民居栉比，鸡犬相闻，极为繁华。但民杂五方，全无藏盖。生齿既众，贸易日多，利息既分，生计日薄。通都大衢之中，虽铺张盛丽，多贷客货，展转起息，至千家无宿储者，十室而五。”

方志的作者以疑惧眼光看待晚明经济发展，虽占当时士大夫阶级的大多数，当时却也有些别具商业慧眼的读书人，持有不同的看法，如李贽（1527～1602）、陆揖（1515～1552）等人。社会风尚的奢靡与物欲崇尚的普遍，造成生活习惯的改变，因此讲求细致的享受与精致的品味，逐渐成为明末文人雅士中流行的风气，则是不争的事实。至于艺术境界的提升，当然不是单纯与必然的发展，而是通过了许多艺术心灵的精神内化。在品味过程中，由原本强调感官享受的乐趣，转化成精神境界的认知体会，并与艺术传统的想像脉络达成呼应。从李渔《闲情偶寄》、张岱《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士人独白中，我们可以充分体会到由生活乐趣升华为艺术境界的执著，显示了晚明文人在纵情声色之际，又同时努力进行自我超升的现象。晚明士大夫因追求感官享乐而逐渐发展出的精致品味，也因汤显祖、高濂、张岱这一类文人的艺术提升，得以赋予较高的文化意义，成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奠定晚明文化风尚的母体是江南固有的文化传统。在长江天险的佑护下，汉末孙氏家族割据东南，吴政权使江南文化从秦汉的低潮中逐渐复兴过来；接下来从东晋司马氏立国江南到南宋偏安江左几百年间，原来生活在中原地区的氏族翘楚、衣冠文士，为躲避中原战祸纷纷迁徙江南。凭借着大量的人口与财富，江南的汉族政权得以大力开发江南。魏晋氏族南迁不单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而且促使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融合。氏族带来了彬彬文风，逐步取代了吴越文化中原来的勇武精神和巫祝风气。来自中原的玄学从哲学层面影响到整个南方的文艺潮流，文艺鉴赏的自觉和人的地位在文艺中得到提升，是中国文化史中值得大书特书的重大变化。从六朝到南宋以至明清，江南的艺术风尚一直在以文人为主导的品味中发展变化，典雅的文人传统、精巧秀润的风格、俏丽的气质与兴味，深深地影响着中国艺术精神和生活情趣。

在江南文化发展史上，苏杭两地所起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元末



雨淋墙头皴图轴

混乱时期，张士诚将苏州作为他的根据地，苏州当地的富豪们也都支援他。以至明代，苏州地方不仅在经济上仍受到压迫，还要承担高于其他地区的赋税；在文化上，统治者的镇压也从未间断过。因此，在苏州市民中产生了一种顽强的抵抗精神，尤其是在明代中后期苏州官民之间多次爆发激烈的对抗。继承这种抵抗精神的文士隐者，又称市隐，他们蔑视朝廷的一切，在文化上有着很强烈的独立意识。仅举吴门绘画刻意排斥浙派院体的审美风尚，追索文人士趣就是明证。另外，苏州虽然是市隐、诸生向往定居的地方文化中心，却造就了一批大官僚，他们归来后，这里又成为官宦们耀武扬威的地方。在苏州文化影响下的松江，风尚虽与苏州相同，但又与苏州因地缘衔接，在文化上存在着某种竞争态势。与董其昌同时，松江出过内阁大学士徐阶这样的首辅大臣。有这样一种看法，文化上苏州书家自祝允明后一蹶不振，松江出了一个董其昌后，书坛霸权就转移到松江了。



董其昌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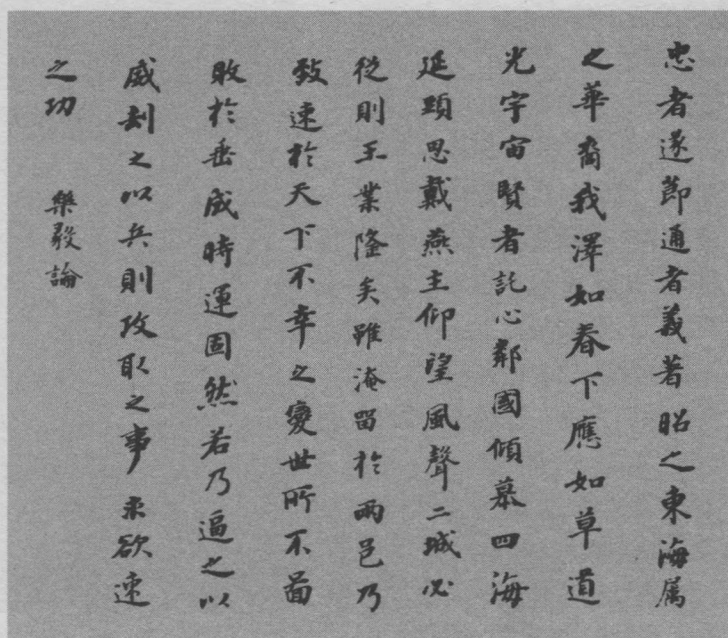
我们所要讲述的主人公——董其昌，就是这一特定的历史、地域、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士大夫代表者。

其人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香光，别号思白、思翁。松江华亭人。董其昌是中国美术史上最为复杂、最多争议，亦最易被误解的人物之一，其充满矛盾的一生令当今的史家们困惑不解、是非难辨。由于汉学的普遍衰退，以及缺乏文、史、哲及美术、宗教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成果为依据，这些推测或因政治性的先入之见或因盲目的不加批判的接受而日益滋长。寻找真实的董其昌，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将曲解臆测与文献记录、传闻与史实之间进行一番比较、鉴别。

没有显赫家庭背景的董其昌在 1589 年的会试中考取进士，三个月后，从当时的 347 名进士中，他被选进翰林院，充任“庶吉士”一职，主要负责起草朝政文书和编纂历朝官史，由此开始了他大半生的宦海生涯。1599 年（一说为 1598 年）董其昌充任皇长子“讲官”一职。同年被授予湖广按察司副使一职。1604 年又改任湖广提学副使一职。1620 年充任太常寺少卿一职掌管国子监司业事。1622 年充任太常寺卿兼侍读学士，同年兼任纂修官参加编纂《神宗实录》。1623 年充任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一职协理詹事府。1624 年又升任礼部左侍郎一职。同年董其昌改任南京礼部尚书一职。1631 年董其昌终于达到他政治生涯的顶峰，充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詹事府的显赫之职。这些官职列述表明：董其昌作为一个书画家获得了在明代绝无仅有、在历史上只有燕肃、赵孟頫、高克恭和宋迪得到了可以与之比肩的令人注目的显赫政治地位。

显赫的政治地位，并没有使其成为权力游戏中的核心人物。四十多年的官场生涯，董其昌大多远离权力，过着闲散的市隐生活。他的长处在于能够在纷繁的政治斗争中保持一种平衡和距离，这在董其昌的政治



樂毅論

杂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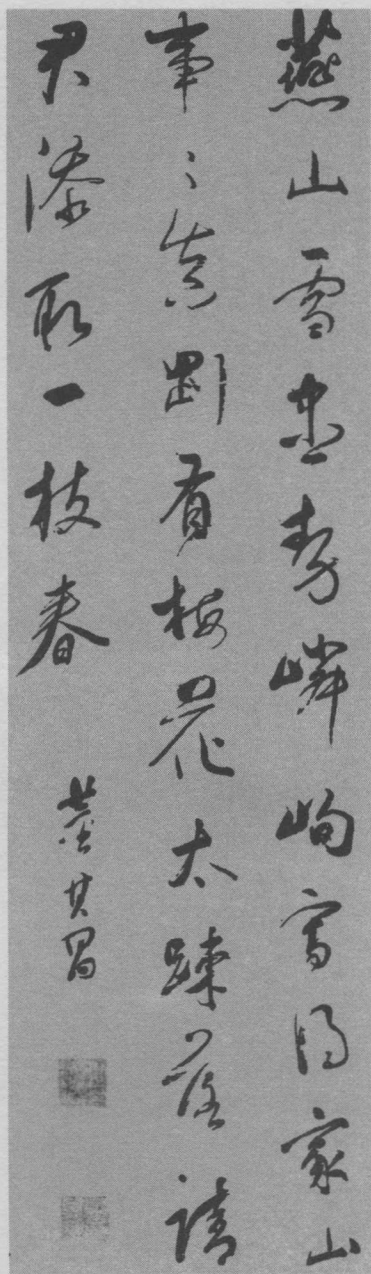
交往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总体而言，董其昌不是一位政治成功人士（政治家），只是善于靠自己的聪明和敏感维护自身的社会地位。

至交朋友的遭难促使董其昌逐步从宦海沉浮之中自觉地摆脱出来，从而实现由政治到艺术的人生转向，实现了个人“原型”的内在转换。

在明代官僚政治的逆境中，董其昌的政治观念还是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以便在朋友和敌人中间把握住一个适当的立场。他既是一位敏锐的分析家，又是一位高明的生存者。“他经常以“勇退”而受人颂扬，这受“出处”、“进退”的儒家准则所支配的品德，其道德价值虽然令人怀疑，在政治斗争中却至为重要。

尽管如此，董其昌从未变成一个悲观主义者，在其思想的深处似乎真心倾佩春秋、战国时代的武士和刺客那种无所畏惧的反叛精神，这在其书画中突然爆发出的豪迈不羁之气能得到偶尔的、下意识的表达。除了作为杰出的艺术巨匠和不忠诚的政客之外，董其昌还有鱼肉乡里、纵恶豪夺的可恶一面。

家宅被焚事件决非历史仅见，但是从这一事件中折射出董其昌的道德品行之恶劣，决不符合儒家的道德规范。事件的起因是：董其昌儿子董祖常看中了生员（秀才）陆兆芳家中的使女绿英，并强行诱骗之。



行草诗书

后来使女绿英探母未归，董祖常指使奴仆不问青红皂白捣毁了生员陆兆芳的家宅。这种霸道不义之行被当地人编成说唱曲本《黑白传》广为哄传。董其昌闻知查询，由此牵涉到当地另一名生员范昶，致使范昶在胁迫中忧惧而亡。范家为之愤愤不平，范昶的祖母及家眷一起到董其昌的门前哭骂，由此而遭到董祖常及家奴的殴打和凌辱。暴行引起全城民众包括下层知识分子（生员）和松江府官员的共同义愤。据《民抄董宦事实》中载记：“三县军民乌合万余，共称报仇，忽于本日酉刻，烧毁董宦第宅。”董其昌的“四宅焚如，家资若扫”，最后他携家眷仓惶逃避外地。有关这次事件，朝廷的裁决是让董其昌的那些大权在握的朋友来处理。董其昌实际上没受到任何处罚，因为他的老同学吴道南为两个大学士中的一位。可见明末吏治的堕落和官宦人家的为所欲为是何等的严重。

交 游

董其昌一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结交朋友的范围很广，但大致有如下三类：第一类是政界朋友，如叶向高、冯从吾以及东林党人顾宪成、高攀龙、周宗建等。第二类是思想界、文艺界的朋友，如李贽、达观禅师、憨山禅师、陶望龄、袁氏三兄弟、汤显祖等。第三类就是书画界的朋友，如陈继儒、丁云鹏、邢侗等人以及苏、松等地的书画家们。

大学士许国（1527～1596），他是1589年那场会试的主考官，在这场会试中董其昌名列第二。董其昌把许国视为自己成功的提携人。另一位大学士王锡爵（1534～1610）注意的是董其昌作为书法家的技艺。王锡爵在观看了董的翰林阁试卷后，曾赞扬他深得唐代著名书家欧阳询和柳公权的精髓。董与王家——不仅是与王及其儿子王衡，尤其是与王的孙子王时敏成了世交。王时敏后来成了董其昌最喜爱的学生与门徒。1592年



书额墨迹

末,王锡爵复被召进朝廷,1593年5月在王返朝后四个月,董其昌终于晋升为翰林院编修,任职六年之久。董其昌在翰林院的馆师之一韩世能(1528~1598),在16世纪晚期也许可被列为京城首屈一指的收藏家,他的收藏很是显赫。现在无法得知董与韩的关系是建立在政治还是艺术欣赏基础上,还是两者皆有,有一点可以肯定,董与韩家两代人的私交是极为密切的,韩家的藏品对董的书画创作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董氏核心圈子的朋友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后来成为东林党的活跃分子,其中包括东林党人中最杰出的领导人物顾宪成(1550~1612)和高攀龙(1562~1626),他们是东林政治运动的领袖。董其昌和高攀龙的关系似乎特别微妙而密切。阔党之祸至天启五年(1625年)发展至顶点,董其昌的朋友与魏忠贤为首的、日益专权的宦官进行反复较量和不懈斗争,但结果却是,他们或被抄宅免职,或被流放充军,或屈死狱中。叶向高较董年轻7岁,据陈继儒言,正是回京任首辅的叶向高于1621年提拔董其昌在北京重新任职。通过叶向高的关系,董其昌接触了与东林党密切相关的那群官员。叶向高在1624年7月家宅被魏忠贤指使的宦官搜抄后而愤05书额墨迹1605~1610年前后39.3×137.2cm然辞官。董其昌在叶辞别时,为他赋诗一组共四首表达自己的感受。冯从吾的命运更加悲凉,削籍还乡,并且“毁书院,曳先圣像掷之城隅,从吾不胜愤悒,得疾年”。顾宪成也因“不平上疏,语侵执政,被旨切责”。最后终被革职还乡。还有高攀龙、周宗建在宦官的迫害下,一个投水而亡,一个毙死狱中。

在这种党祸惨烈、朋友遭殃的处境中，董其昌内心的忧惧是可想而知的。

在 1599 年至 1621 年的漫长的闲居岁月中，董其昌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是吴正志（现江苏宜兴人）。董吴结识应该在 1589 年他们考中进士之前。吴正志因一时冲动为吏部文选司员外郎赵南星辩护而后遭到贬职，这引起了董的关注，巩固了他们的友谊。1600 年，董其昌在隐退一年之后，曾登门拜访吴正志在荆溪的府邸，应吴之请，挥毫书写王维的诗句（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两人在闲居期间时常相见，分离时则音书往返。吴也是个名副其实的收藏家，虽然收藏远不如董丰富，所拥有的一些作品还是来自查转让的藏品，其中就有著名的赵孟頫《鹊华秋色图》，后来还有董最珍爱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

虽说是书画艺术所提供的日常气氛使董吴友情日笃，但从更深一层而言，他们的交情植根于他们共同的政治命运：他们被派任省职，远离权力中心的北京，以后他俩决意宁可辞官，也不愿屈尊在平庸的官位上浪费时间，埋没才干。1611 年董其昌为吴正志画的一幅短轴《荆溪招隐图》（翁万戈先生收藏），即可看出其政治含义。1612 年 8 月，吴正志接受了南京刑部郎中之职。1613 年董其昌在此幅画上加了题款，声称自己已无意做官，但力劝吴坚持走相反的道路。

1616 年董其昌面临了一次甚为严重的打击。由于其子在当地引起了骚乱，朝廷的裁决大权掌握在董其昌的老同学——大学士吴道南手中。董其昌受到了保护，那是显而易见的。吴道南是董其昌的翰林老同学，1609 年提为礼部尚书，1613 年授大学士。他曾与董在 1599 年一起做过皇帝长子的讲官。

董其昌于 1624 年春天返回北京就职，再度提升似已在望。东林党尽管遭到了诸如首善书院被迫关闭的挫折，但到 1624 年夏天，却已接近全胜。当时掌权的七个大学士中，有四个可列入东林党的营垒，而且，赵南星占据了吏部尚书这一要职。1624 年 7 月，董其昌为赵南星作了一幅精湛绝伦的画（现藏广东省博物馆），此幅画作，构图严谨缜密，在董其昌问世纪 20 年代的早期作品中尚属罕见，足见董其昌为如此显赫的达官作画时的良苦用心。1624 年 8 月，高攀龙擢升为掌握大权的都察院左都御史。董其昌不仅与赵南星和高攀龙有交情，而且至

彭子任明人士就其整者
趾相錯也謂夢居兄弟
曰者弟力田耕者持老
高賢良方正直古推諫
商曹勉之夢至夢后
以應士名臣藉其侍從而
延長待書之澤恢弘度
文之儲者公之既應既策
終者望年則孝氏之表
才公雅不多誦讀而賢
性閑敏曲行純備執表
孫意哀感路傷斜眼取
瘡產年華主迎卷寡姑
老耄蓋諱內外仰以奉
火者甚而赴人愬急唯力
是視造夢傷色夢行道
上遇一隸賸棉而恥帝以
官銀盡于陸博大懼撈掠
金服是甘公探懷中數
銀據主輕於瓦注廣文
公官重慶雲朋全上揭
臺案代構覽序者言

石屏蕭宇中唐別解二年
居士桐城年夢之詳具
大學士親公理臨中不復
贊
史氏曰天觀定士觀友
為夢日益為道日損蓋自
盡世也太公依仁為賢之強
義生風其過夢應全概
耕殿步必雅修計然之
笑而不泔精記勝之術
而不推善節供之行而不
撲舍義方之節而不賜既
則既張後得於陳結言
得教无贊休明天道無
親帝無善人孝氏之亢
者以我者以我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
侍讀學士
曾輕刻題裁
征廷議諸官年家侍生
董其昌撰并書

《康義李先生傳》

少与其他二位大學士都有交情：叶向高、朱國幀曾與董同年考中進士，而且跟馮從吾一樣，是董的翰林老同學。

東林黨在魏忠賢日益膨脹的權勢面前逐漸失利。當魏忠賢完全左右了年輕的皇帝熹宗時，自1624年10月始，東林派遭到了大規模的《康義李先生傳》1625年26.5×333.5cm上海博物館藏模的罷黜，1625年這種驅逐已演化為全面的清除。在這場政治鬥爭中，董其昌表現得毫無烈性，竭盡所能結好魏忠賢的同黨。他的書畫藝術成了達到這一目的的理想手段：以一種非政治的方式去結交某些人，董其昌得到他們的友誼是具有政治功利的。董其昌書《康義李先生傳》（現藏上海博物館）可充分証實他在政治上的這種見風使舵的本領。這篇傳記是董其昌在1624年尾或1625年初撰文并書寫的。傳主李反觀的儿子李魯生（字尊龍），山東沾華

先生傳

翁方綱書

翁方綱書

翁方綱書

翁方綱書

翁方綱書

翁方綱書

翁方綱書

翁方綱書

翁方綱書

翁方綱書

翁方綱書

翁方綱書

翁方綱書

翁方綱書

翁方綱書

翁方綱書

翁方綱書

翁方綱書

翁方綱書

翁方綱書

託為所史父京傳相道者

明從甚都視瞻弓與公

性居後覽之自於廣文公

曰此盜也當嚴為備大集

昭徽文平踐史探衡刀

斗之聲竟夕不歇露解

主事何召到富民劉氏

千金者家是矣邑大相

事所談言弓就公筆者

公曰滿海之區以抄簿相

何應于度時方飲次即取

案上盤蓋為喻決孟則

盤受之決盤則孟受之此

決蓋無形失火以此法行之

雖概及千百頃殆相款耶

不竟鄰白柔在乃公盤孟

中其時智多太眼顧此公

凱多居凡和不為小慈開

說古今時送一難先宿心

折為居望仕那臺令公

送之鄉語之皆六處諺也

謂公不竟學可不可也公

人,1613年中进士,接着连任四个县的知县,1624年4月授兵科给事中。通过魏忠贤,李反观得以进入宦官集团,由于“卑污奸险”,马上成了宦官阴谋的参加者。1625年,冯铨授大学士后李反观的权势愈来愈大。此卷后有时人六款题跋:两款是大学士魏广微所书。魏广微对董其昌的赞赏跃然纸上;第三款是大学士朱延禧所书,1624年夏,董其昌曾应朱延禧的邀请,观赏了《夏景山口待渡图》;第四款是大学士冯控所书;第五款是陈名夏所书;第六款是钱谦益所书。政界要员联合题写一幅手卷,显示出他们之间存在着的政治关系。在魏忠贤贬死及其党羽失宠之后不久,1630年董其昌汇编其著作,他的那篇李反观传显然使他颇感难堪,因为这显而易见地证明了他与阉党成员的亲密关系。然而,作为得意之作,董其昌作了一些小小的修改作掩饰,收进了《容台集》。改动后的文章让读者全然不